

这两年，常常听到传来复旦同事英年早逝的消息。三十多的，四十多的，五十多的，都有。如今年四月病逝的哲学系汪堂家教授，享年仅52岁。52岁在古代不算短寿，但在上海男性平均寿命已达79岁，女性83岁的今天，让人觉得实在是短了。

堂家虽比我大几岁，但我们基本上还算同辈人。跟他不是很熟悉的朋友，但也多次在一起吃饭、聊过天。这一切，正如王羲之在《兰亭序》中所写：“俯仰之间，已为陈迹”，悲夫！

《兰亭序》中还有两句话，那就是“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一死生”与“齐彭殇”，说的是庄子。

庄子在《德充符》一篇中有“以死生为一条”的说法，又在《齐物论》一篇中写道：“莫寿于殀子，而彭祖为天。”在他看来，死生都是道的变化，故可视为“一条”；从相对的角度来看，夭折的孩子相对于许多短命的昆虫，已经是长寿的了；而据说活到了八百岁的彭祖，相对于天地的寿命，也是短寿的。

东晋是道家思想流行的时代，王家也世奉“五斗米道”，为什么王羲之要说庄子“虚诞”和“妄作”呢？

看着同侪一个个英年早逝，怎能无动于衷地“一死生”、“齐彭殇”呢？不可能不

免死狐悲，生出感慨来的。况且在不同的时代，人都有一个大致平均寿命或者预期寿命，早于这个寿命而死，是特别让人伤怀的。

最近常常在读的一本书是《世说新语》。这部书读过多次，都没有读完，这次算是从头到尾把它读完了。里面有不少关于死亡的感慨的故事，其中有一则是这样的：“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

这里的王长史指的是东晋名士王濛。他不但出身名族，而且身兼美貌与美才，是当时有名的清谈家，也是《世说》里经常出现的人物。《晋书》记载他“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

生如此儿耶！’居贫，帽败，自入市买之，姬悦其貌，遗以新帽。”他漂亮到这种程度，去市集买帽子，连卖帽子的老婆子也喜欢他，就把帽子白送他了。

他还是当时有名的清谈家，晋书说当时“凡称风流者，举濛、(刘)惔为宗焉。”

晋人清谈时好持用麈尾制的麈尾。王濛在临死时，是想到了自己作为清谈家的名声，故要“转麈尾视之”了。想到自己身兼美貌、美才，可是竟活不过四十，确实是令人遗憾、悲伤的。

《世说》里还有这样一则故事：“王珣疾，临困，问王武冈曰：‘世论以我家领军比谁？’武冈曰：‘世以比王北中郎。’东亭转卧向壁，叹曰：‘人固不可以无年！’刘孝标注云：‘领军王洽，珣之父也。年二十六卒。珣意以其父名德过坦之而无年，故致此论。’《晋书》则说王洽活了三十六岁。不管怎样，王珣都是早死的。

王珣病重，却在问别人世人对自己父亲的评价。他父亲王洽，

是东晋名臣王导之子，《晋书》说他在“导诸子中最知名，与荀羨俱有美称”，可惜死得早，来不及建立什么功业，所以世人只不过将他跟王珣不起的王坦之相提并论，所以王珣发出了“人固不可以无年”的感叹。

当然，英国诗人济慈二十六岁去世时，已是蜚声于世的大诗人，但又有几人能早慧如济慈呢？况且，如果济慈能再多活几岁，他又可能多给我们留下多少美妙的诗篇呢？

人生百年，不过是地球生命史中的一瞬；不管建立何等功业，等到太阳崩塌、地球毁灭的时候，一切都要归于消亡。从这个角度来说，似乎一切都是无意义的。但难道就因此，我们就可以浑浑噩噩、邈邈遥遥地过一生吗？

人生在世，多少会有一些志向和抱负，这些都需要时间去完成。考虑到一个人要留下的历史遗产，不能没有寿数。

最后，想说的是什么呢？无非是朋友、同事、读者都要善自珍摄，保重身体。即便是为了工作，我们也需要寿数。

以前徐城北先生有个小集子《一鸡三吃》，大学寝室的卧谈会聊起寡淡的食堂菜，这本小书的标题就老被我们半大寝室的中文系宅男用过来过口水。其实家里父母做饭，一只整鸡或清炖或白斩或红烧；真正的一鸡三吃，是在美国过感恩节吃大火鸡。不吃三吃，怎消化得了？

一到感恩节，火鸡这时超市里乏人问津的“大只佬”成了家家户必备的主菜。洛克维尔著名的画作《免于匮乏的自由》里，画面居中夺人眼球就是老祖母刚刚端出烤箱的一只金黄色的大火鸡。但眼见为虚，口尝是实，对挑剔的中国舌尖来说，头两年感恩节大餐上的火鸡肉肉“味同嚼蜡”的境界相去不远。可是碍于朋友辛苦的准备和热情的邀约，只好把这又柴又臊的火鸡囫圇塞进嘴里完事儿。这痛苦又难以拒绝的感恩节火鸡，直到第三年在 Irene 家里，终于让我有了颠覆性的体验。

美国人的火鸡做法无外两种。最经典的传统烹制做法就是刷完糖浆，把面包干和坚果仁做的填料塞满火鸡，放进烤箱烤上大半天。上桌之后，照例由朋友操刀切肉，分给每个人蘸酸莓酱吃。常听美国朋友说自己妈妈烤的火鸡的美味是天上地下无，一只25磅的大火鸡，感恩节后的肉，还能做火鸡三明治，够两个男孩带两星期的午饭。反正我对此是不敢恭维。

另一种做法只是耳闻未曾实现，因为有很高的危险系数——油炸火鸡，而且是整只火鸡！此法需在开阔地方支大深锅一口，下半锅油低温烹炸。看过别人展示的照片，为了把几十磅的大火鸡平稳放进油锅，还得在锅口上方支一个吊架，用滑轮葫芦吊着火鸡。前年的新闻曾报道过有户人家炸火鸡没有控制好油温，刚解冻还湿漉漉的火鸡一下锅，引起火灾烧掉了房顶……

Irene 是老上海，摸索了三十多年才终于特创出了这西雅图独一份的一鸡三吃。第一步的做法跟美国传统大同小异，所谓小异就要增加腌制入味的过程，用整杯盐和一杯冰水浸制火鸡至少十二小时。而火鸡肚里的填料，采用的是中国菜填八宝鸭的配方，香菇木耳金针火腿各显神通，而甜糯米更是所有孩子们的最爱！这第一吃就是供感恩节的晚餐专用，分肉剔骨晚毕，便是二吃三吃粉墨登场的时节了。火鸡骨可熬粥，火鸡剩肉炒肉松。一个火鸡骨架，得用几十升的大锅配粥在烤箱里绵熬一夜，肉碎完全散入到粥汤内，东方稻米的甜香把美国火鸡粗豪的原味转制成一种出乎意料的异香，再撒上干脆的火鸡肉松，这感恩节这日的午餐把 Irene 家所有的本地亲戚都吸引来了。侄女婿 Chris 在微软做管理层，素以美食家自居，每年都不会缺席这次的日粥粥宴，这回还专门带着自己的意大利老母亲来品尝。这一鸡三吃，真所谓中西合璧，天下无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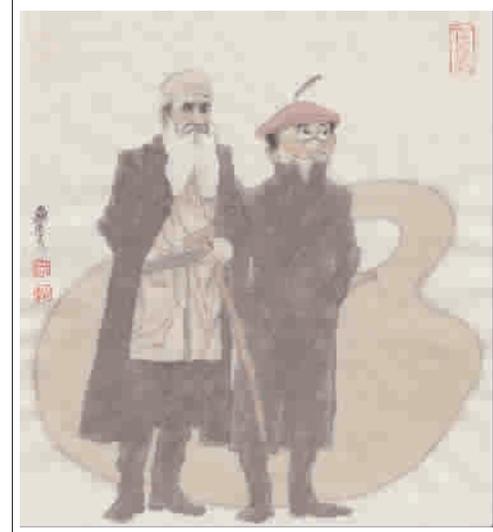
(发自西雅图)

# 一鸡三吃

王晓熊



边看边聊



## 墙上勾勒

(牛博士对马姐说)  
戴逸如文并图

1910年11月。俄罗斯边远小镇阿斯塔波沃。火车站站长卧室。旅途中的托尔斯泰慢性肺炎再次发作。他被安顿在一张小床上。一星期之后，托翁谢世。一位粉丝拿铅笔沿着托翁遗体，在布满繁花的墙纸上，用心描摹下托翁仰卧的轮廓。线条稚拙，却似有磁力，似有气场。我一见到已淡的此像即如遭电击，那感觉很快弥漫了全身。我的景仰之情被吊起、被发酵，鼓胀欲裂……我不知道，一百多年来，这张小床边的遗像，震撼过多少景仰者？

这是有生命的墙上勾勒。如今，发泄式的涂鸦肆意扩张，到处泛滥，骚扰着视觉与市容。那是迷惘灵魂的躁动与游击。奇怪的是，居然还有人人为之倾情鼓吹。

我想，我们常常讲的创造力，并不体现在人云亦云的胡涂乱抹，而恰恰是去发现、创作出这样的墙上勾勒。

泰戈尔写道：“于世无求的人，他是个自安自足者；春天的柔气是为他的，还有繁花与鸟语。”我要续写一句：还有花开不败的墙纸上，与岁月一般绵长而遒劲的线条勾勒，为他，更为了后人。

母亲老了，身体每况愈下。不仅有心脏病，还有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关节炎，总是吃药。瑜伽不错，对身心健康有好处。但母亲年纪大了，练瑜伽行不行呢？

一开始，我发现母亲的上身只能压到45度左右，根本达不到瑜伽要求的标准。于是我便站在母亲身边帮她往前压。可是一套动作做下来，母亲不但没有全身轻松的感觉，反而觉得腰酸背痛。

我认识到，母亲年纪大了，骨骼肌肉不够灵活，力量不够。瑜伽追求的是自然、放松、柔和的境界，而不是非要达到什么目的。根据母亲的身体状况，我专门设计了一套适合



七夕会 运动休闲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声势浩大，近两千万城里中学生下到农村。他们中有北京、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重点中学的高中毕业生。我国农村教育落后，贫穷是一个原因，更突出的是师资薄弱。而大城市的重点中学，如北京的四中、八中，上海的上海中学、师大二附中，天津的一中等，教育质量全国闻名，根本原因是师资好，教师中不乏赫赫有名的教育家，名师指点之下，学生焉能不强！他们具有良好的文化基础和综合素质，为充实农村教师队伍，大面积提升农村师资水平，培育农村人才和提高农村劳动力水平，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 光辉岁月难忘记

张持坚

指点的，新教师们“照猫画虎”，认真钻研，渐渐地自如起来了。知青老师的素养、学识和见多识广所形成的气场，很快弥漫在了简陋的教室里，昏暗的课堂于是变得明亮，穿透破旧门窗的寒风雨雪也似乎柔弱了许多。学生们不再耷拉着脑袋，而是睁大眼睛，挺起身子，尽情地吮吸着、吞咽着，压在心底的对知识的渴求之火燃烧了起来。他们的父辈也变了，再也不说“只要识几个字能干活挣钱就行了”，而是叮嘱孩子跟着知青老师好好学，多读书，将来有出息。

景况就这样迅速地改变着。它彰显着文化、知识和文明的巨大威力——即便在那荒诞的时代！之后，更多的知青站到了讲台上。他们在知青大军中，是很小的一部分，不过，确是“分量”颇重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文化的使者，是知青在农村播撒文明种子的代表——尽管当时没有意识到。知青的学生、后来担任黑龙江农垦总局团委书记的小徐告诉我：他的老师是杭州知青。老师的宿舍里有许多书，那里成了他的第二课堂。高考恢复后，老师考上浙江大学，临走把书留给他，凭着老师的教诲和这些书籍，他考上了大学。后

## 今宵打诨

陆贞雄  
只问不答  
(二字电脑名词)  
昨日谜面：“昭和棋圣”称雄棋坛(电影导演)  
谜底：吴子牛(注：吴清源的棋子很“牛”)

作，比如颈部练习、肩旋转功、“风吹树”、“摩天式”等。待母亲熟练掌握后，再渐渐增加了瑜伽砖、休息术的锻炼。3个星期后，母亲便熟练地掌握了大部分动作的基本要领。

春暖花开的时节，每天清晨，我都和母亲一起在小区的树林里练瑜伽。花香袭人，空气清新，心情非常好。白雪飘飘的季节，我在家中专门腾出一方空地，在悠扬而舒缓的音乐中练习。这样一来，母亲信心大增，有了持之以恒的决心与勇气。

现在，母亲的血压稳定，脑动脉硬化症状减轻了，困扰多年的心脏病、关节炎也减轻了不少，这都是练瑜伽的功效，有助于老年人舒活筋骨，强健四肢，加快血液循环。

来她妹妹把书接过去，也考上了大学。人这一辈子不能忘记的人除了父母，他把知青老师排在头一个。

黑龙江的黑河市，建起了我国第一座颇具规模知青博物馆。馆长刘树新也是知青的学生。他告诉我，从1968年知青下乡到1979年返城，知青老师共教了约10届学生，总数约有一千万。我听了心不禁一震，这“一千万”可不是一个寻常的数字，而是一个千万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有什么比培育了那么多农村的新一代更值得知青骄傲和欣慰的呢？如今，这“一千万”正影响着他们的子女，影响着周围的人，影响着我们的社会……

在早期上海电影业的创办和发展历史上，有几位外籍人士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意大利人A.E.劳罗(“劳罗”一译“罗乐”)就是其中之一位。

提到劳罗，电影研究者和影迷们首先想到的是四川北路虬江路曾经矗立着的一座影院——上海大戏院，英文则是 Isis Theatre。这座影院，是1917年由劳罗和中国人邓子羲等几位共同出资，将原来的一座演出传统中国戏曲的剧场改建的，同年5月正式开幕。上海大戏院正门朝向虬江路，等到1927年大修以后，将大门转向了四川北路。鲁迅曾经在上海大戏院观看了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电影。

劳罗在上海不只经营电影放映业，他更着意电影的拍摄，早在1905年前后，他还在上海的茶楼放映那种一本本长度的片之时，他就开始拍摄了若干上海街景，并由此渐渐生出了制作一部真正的故事电影的想法。

1914年，机会终于来临，他和当时上海的一群文明戏(早期的本土化“话剧”)艺人合作，根据他们的舞台剧演出，拍摄了一部有情节的影片。这部影片揭露吸食鸦片所带来的恶果，名曰《黑窟冤魂》(英文名 The Curse of Opium)。

劳罗在拍摄过程中曾遇到不少难题，比如，中国艺人没有受过电影表演的训练，总是喜欢盯住摄影机镜头，以致常常出戏；而且，当时文明戏舞台上没有女演员，因而，劳罗也只能退而求其次，让男艺人来扮演剧中的女性角色。这部不能算成功的影片后来湮没在影史中，但直到1930年代中期，劳罗仍保留了该片的少部分底片，据说那时他常常会取出

这些底片，看着它们，想到早年的这些努力，他时不时地会开怀大笑。而他总共拍过不下两百部片子。

劳罗在上海以及之外的地区拍摄了不少纪录片影片，据他自己说，他去北京拍过皇太后的丧仪，此片曾在英国放映；而1911年在江湾上空作飞行表演失事身亡的法国人环龙(Rene Vallon)，也被他纪录在胶片上。他在上海创办了一家电影公司，称作“罗乐电影公司(罗乐，即劳罗)”，英文名为 Lauro Films，具体的办公地点则先后安置在仁记路(今天池路)，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博物院路(今虎丘路)上的光陆大楼等处。

劳罗还是试验制作彩色影片的先驱人物，他曾尝试用深褐和绿两种色调来印胶片，其结果是，1911年，他制作的一部名叫《中国风俗》(The Customs and Habits of China)的影片，作为艺术品在罗马博览会上获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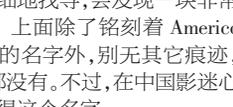
劳罗1879年生于意大利的那不勒斯，1900年前后来到了上海，作为早期外国侨民，开始了他的电影业经营。他一生无子女，妻子M. H. Lauro于1933年去世。1935年，劳罗前往菲律宾马尼拉，1937年1月，他因患病回到上海接受治疗，于同年2月6日在医院去世。几天后，他下葬在当时的静安寺路公墓(即现静安公园)。

## 记录过上海的意大利人

汤惟杰



夜光杯



七夕会 运动休闲